

文化溯源

李邕职守陈州行迹考

冯剑星

李邕作为盛唐“独步有唐四十年”的文章、书法大家,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职守陈州期间,因坐事下狱,遭遇人生重大的一场变故,直接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和其书法发展的走向。考证李邕职守陈州期间的行迹,对于研究他的行迹与书法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年)冬天,四十九岁的李邕在海州刺史任上改授陈州刺史。他在离开海州之前,刚刚完成了著名的《海州大云寺禅院碑》(已佚)、淮阴的《婆罗树碑》和唐睿宗《老子孔子碑》(已佚)、唐玄宗《颜子赞》(已佚)的书丹工作。同时,荆州的胡履隶书完成了李邕的诗作名篇《六公咏》(已佚),镌刻成碑。

甫一到陈州任,李邕即着手撰写了《大云寺禅院碑》(已佚),并为太监会恩勳生父杨历的《赠魏州刺史杨历碑》(已佚)撰写了序文,为绛州《薛元允碑》(已佚)撰写了碑文,由白羲胥隶书立碑,并重新撰写了陈州的《八卦坛碑》(已佚)。就是在这个时期,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完全成熟,这也是他书法创作的黄金时期,频有佳作,可惜都未能传世。在陈州的职守工作,对于青年已经名满天下,被时人称为“文章、书翰、公直、词辨、义烈、英迈皆过人,时号六绝”,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庭珪推许为“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的李邕来说,虽屡遭贬谪,沉浮下僚,当属中年闲适,足抒他多年的抑郁之怀,所以他才能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按照唐朝朝政惯例,地方官员任职期满后,要到京城接受吏部考功司的考核,根据其政绩优劣,确定其官职的改转升降。开元十二年(724年),李邕从陈州出发,到京城接受考核。在出发之前,他把自己历年所作诗文,缮写成册,以文坛耆老之尊拜访了刚刚“连中三元”的青年才俊孙逖。这也是李邕长期爱士为好、奖掖后进的习惯。比如早在开元九年(721年),他途经汴州时,闻诗人崔颢之名,特意请来相见。杜甫有诗亦云自己与李邕结识是因为“李邕求识面”。到了天宝二年(743年)在滑州刺史任上的李邕,特意写了一篇《鹤赋》,派人赠送给还在草莽之间的高适,以此相激励。高适自云:“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鹤赋》以垂示适,越在草野,才无能为,尚怀知音。”史载李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这些都可作为有力的佐证。后来,颜真卿在为孙逖写的《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集序》中专门提到此事:“江夏李邕,自陈州人计,缮写其集,贲以诂公,托知己之分。其为先达所重也如此。”

二

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东巡封禅泰山,完成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壮举。十一月,回銮东都,驾过汴州之时,李邕特意从陈州赶来,拜谒于道左,献上辞赋多篇,唐玄宗读后甚为欣悦。李邕本为唐玄宗旧臣,早在唐玄宗东宫时,就曾和崔融、倪若水等受到礼遇。这次故人再见,自然感情非同一般。史称:“邕见帝汴州,诏献辞赋,帝悦。”李邕其人本就偏狭好名,自视甚高,又多年左迁外地,难张怀抱,忽得皇帝垂问,一时间忘乎所以,竟然“由是颇自矜炫,自云当居相位”。这种浅薄的政治错觉,不免让宰相张说大为反感。张说对此“甚恶之”。而李邕对张说也是“邕素轻张说,与相恶”。嗣后不久,李邕就遭到监察御史薛自勤和庾狄履温的联名弹劾,以“赃货枉法”的罪名入狱,论罪当判处死刑。杜甫在《八哀诗》中谈到此事时指出:“是非张相国,相抱一危脆。争名古岂然,关键款不闭”,认为李邕所以下狱,完全是因为与张说“争名”所致,联系到后来杜甫在济南和李邕密切的交往,此说当为可信之论。然而,当此生死存亡之际,李邕朝中故友却无一人伸出援手,为其开脱罪责。如已经身居高位的宋璟、张九龄、张庭珪等人,以至正炙手可热的孙逖,对于李邕的人狱都保持了不应有的沉

默。之所以如此,朱关田先生认为:“……亦系李邕露才扬己,有以取之……且疏散无检,傲慢不忍,终于为人相扼而几危,此其一。其二,李邕鬻文谗鬼,已为贤者所嗤。广求贿谢,则更为智者所不齿。”李邕久以文章、书翰名重一时,“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贲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他为牟取暴利,以至于为宦官(《赠魏州刺史杨历碑》)、道士(《有道先生叶国重碑》)、僧人(《夜中叶国重碑》)等撰文书碑,肆意谗鬼歌功,深为当时士林所不齿。故《新唐书》本传说他“邕蚤有名,重义爱士,久斥外,不与士大夫接”。但其时张说为宰相,他和李邕的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李邕下狱和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为这袖手禁言,也当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时许昌有名叫孔璋的人给唐玄宗上了一道奏疏,为李邕辨罪,请求唐玄宗能“伏惟赦舍垢之道,弃瑕之义,远思剧孟,近取于邕”。以至于请求自己能代替李邕伏法而死。孔璋认为李邕“有功于国”,重点举了两点:李邕曾于武则天时期,在宋璟弹劾武则天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的时候,武则天迟迟不愿表态,而李邕于台阶下大声疾呼“臣观宋璟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以不畏强权,当庭力争,而能“折二张之角”;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以韦巨源为先帝故宰相的缘故,拟封赠为“武进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处直提议为其谥号曰“昭”,而当时作为户部员外郎的李邕则认为韦氏为韦(韦后)、武(武三思)党羽,长期附和和威,而且诡惑君主,实是巧佞奸邪之徒,不当有此谥号,为此而写下了锋芒逼人的《驳韦巨源谥议》,实能“挫韦氏之锋”。而且李邕职守陈州期间“拯孤恤穷,救乏恤急,家无私聚”。孔璋和李邕本不相识,但是出于对李邕人品风骨的仰慕,而“愿以六尺之躯膏斧钺,以代邕死”。如此仗义执言,足以使人为之动容。特别是“闻邕为知己者死,臣不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之语,更见其情真意切。其实李邕素以耿介好名、不拘细行闻名于世,为取功名、博富贵,多次以身犯险。早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年,笃信长生之术的唐中宗,十分宠信道士郑普思,擢升其为秘书监,身为拾遗的李邕立刻上疏直谏,言辞写得颇为犀利:“陛下下诚以郑普思可致长生,则夷狄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汉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宝且各献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尧舜称圣者,客观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道治天下。”最后竟然以梁武帝信佛为国为警戒,此行可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到了景云元年(710年),谯王李重福造反,派遣家臣王道先赶到东都洛阳,暗中招募勇士。李重福从均州假称乘驛与张灵均向洛阳进发。李重福抵达洛阳,东都洛阳文武百官一片混乱。王道等人率众跟随李重福径直攻取左、右屯营兵。李重福的队伍要到天津桥时,跟随者已有数百人,都手拿武器,助其威势。侍御史李邕先到左掖门,命令关闭拒守,史载:“侍御史李邕先诣左掖门,令关闭拒守。又至右屯营号令云:‘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诚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有顷,重福果来夺右屯营,坚壁不动,营中矢射雨。”此举直接导致李重福叛乱失败,最后投水而死。李邕也因此被擢升为户部员外郎。从此两件事,亦可以看出李邕的犯险博名、孤勇胆识之所在。

表上之后,唐玄宗亦为之感动,于是下诏免除李邕死罪,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孔璋因此亦流放岭南,客死。

李邕出狱后不久,其夫人温氏再次上疏,请求“愿使邕得充一卒”“戍边自赎”。这篇奏疏信息量非常大,比如说明了李邕被弹劾下狱的直接原因是“贷人蚕种,以为枉法;市罗贡奉,指为奸赃”。唐代非常重视蚕业的发展,丝业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唐玄宗本人对蚕业尤为重视,曾多次下诏,如《赈恤河南北诏》要求开彼仓储,时

令贷给。相继颁布了《给复徐泗等州诏》《楚地租外征桑课敕》《给夏州等四道节度以下官俸敕》等诏书,用以支持发展蚕业。李邕刚上任陈州,为了地方繁荣经济,大力发展蚕业,以政府名义借贷给农户蚕种,被人指责为枉法,但是毕竟罪不至死。但是“市罗贡奉,指为奸赃”,这一句,确实是重罪。在陈州街市上公然贩卖外国给朝廷的“贡奉”,而且数量巨大。与李邕同时期的牛肃在《纪闻》中就曾经记载:

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

李邕在陈州市上所贩卖“贡奉”是否是在海州任上所劫掠之物,两者有无必然联系,通过牛肃的记载来推测,当确有其事。《钦定四库全书》中《册府元龟》第一百五十卷有载:

陈州刺史李乐,诈盗受赃,其数甚广。法司断死,国有常刑。时属发生,特申宽典。宜免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外置长任。查阅唐代典籍史料,唐代本无“李乐”为陈州刺史之人,当为误书李邕为李乐。并且“钦州遵化县尉”当为“钦州遵化县尉”才对。在此敕书里值得注意的是“诈盗受赃,其数甚广”一句,足以证明李邕入狱,以至于被问成死罪,其罪行有实,当为不虚之论。

四

于温氏奏疏中还可以看出,李邕的性格一直是耿介孤直,不被当时士林所容,所谓“疾恶如仇,不容于众,邪佞切齿,诸儒侧目”,其夫人所言,当是李邕素来真实的行径状况。文中也讲到李邕在监牢之中的真实遭遇“初蒙讯责,便系牢户,水不入口者逾五日,气息奄奄,惟是听”,命悬一线之间,五日不饮不食,具体是何原因让李邕如此,可以推测为以下三点:一、李邕认为自己是被冤枉,因为被人罗织罪名而下狱,义不受辱,以绝食相抗争。二、遭受非刑拷打,各种刑讯逼供,以至于年老体弱,难受刑讯之虐待,气息奄奄,不能饮食。三、温氏为能博取唐玄宗同情而夸饰文辞,故作乞怜之语。但是,如果从“事生吏口,迫邕手书”一句来看,当属第二种推断。

李邕在遵化县尉任上不久,即以襄助宦官李思勰平叛陈行范有功,迁升为澧州司马,后又迁升为括州刺史,也就是在此期间,李邕又一次被人以受赃之罪弹劾,史称其“复坐诬枉”,然而这一次却是很幸运,唐玄宗念及东宫旧情,下诏免除其罪。李邕的个性张扬恣意,且喜重财好义,结交豪杰,推举后进,负才如贾谊,豪纵似信陵君,行事急躁,遭人忌恨,也是在所难免之事。他为求声誉,在附和宋璟弹劾二张后,从官殿中出来,有人问他:“你地位很低,竟然在皇帝面前造次,若有不测,你后悔莫及。怎么能这么做事呢?”李邕却毫不在意,回答说:“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之?”由此可见其为人行事风格一斑了。所以,当时的前辈卢藏用评价李邕,说他:“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以此言纵观李邕终生,可谓的论无疑。至其晚年,虽在北海太守任上,却深为宰相李林甫所忌,以“刘勘案”遭受牵连,被罗织罪名,竟然以七十三岁的高龄被杖杀,负谤身死,令人扼腕唏嘘。《新唐书》本传评价他说:“邕资豪放,不能治细行,所在贿谢,败游自肆,终以败云。”亦是警人之论。

三

李邕职守陈州前后不过三年时间(723年~726年),然而重大的人生变故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的书法创作方向,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书法创作而言,开元十一年(723年)李邕在海州应淮阴县令张松质所请撰写的行书《婆罗树碑》,其用笔吸收了二王一脉一拓直下的笔法和内擫的笔势,笔力舒展遒劲,给人以险峭爽朗之感。整体风格畅达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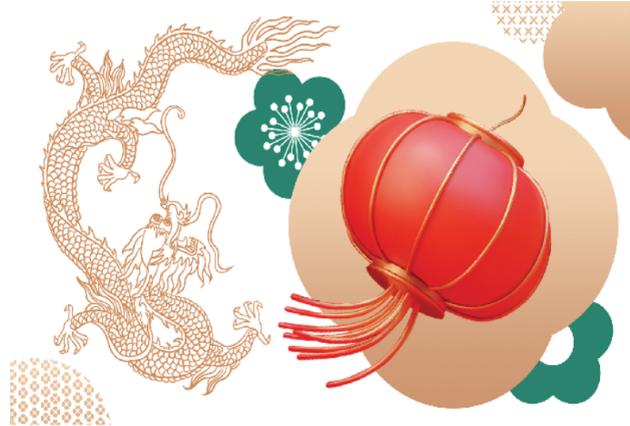
然,流丽华美,一派明快俊逸之意,相较于他同时所书的《云麾将军碑》(720年),风格的清劲瘦硬、奇宕流畅,结体的纵长、顿挫起伏变化,可以说两者风格非常相近,整体感觉如出一辙。可是经过“陈州变故”之后,他的书法作品一改故态。如开元十五年(727年),他在钦州遵化县尉上,于正月廿五日游端州石室后所作楷书《端州石室记》,则笔力凝重,雄秀生威,俨然一派雄健肃穆之态。开元十八年(730年),他应潭州司马窦澄之请所撰行书《麓山寺碑》,则以楷行相结合,整体气势博大疏峻,风格雄健苍浑,尽脱秀润之气。老辣之笔,沉郁之气,读来一览无遗。明人王世贞认为此碑精妙之处在于李邕的《云麾将军碑》之上。何绍基也对《云麾将军碑》和《麓山寺碑》进行了具体的比较,他认为:“《云麾》颇嫌多轻佻处,惟此碑沉着劲栗,不以跌宕掩其朴气,最为可贵。”此碑是最能体现“北海如象”的代表之作,这也说明李邕书法风格前后的明显变化。特别是于碑文后题署曰“前陈州刺史李邕文并书”。开元十九年(731年),他为庐山东林寺所书的行书《东林寺碑》,风格则较为恬淡平和、古雅劲秀,碑文后也题署为“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此时,李邕离开陈州已经五年,依旧题署“前陈州刺史”,可见“陈州变故”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和非同一般的意义。时过境迁,李邕的书法风格已经洗脱早年骏发挺拔、爽利明快的书风,而以沉郁肃穆的面目示人,这一时期可以看出其作品风格由“秀”至“苍”,由“清劲”至“老辣”,由“轻悦”至“劲栗”的巨大变化。

李邕职守陈州期间,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得不提,在开元十四年(726年),二十六岁的李白从扬州而来,至陈州拜谒李邕。根据安琪、薛天纬的《李白年谱》记载:“由扬州西来,或经陈州。时李邕为陈州刺史。初谒李邕,当在此时。《上李邕》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显系青年时代之作。青年时代谒李邕,除此行外,别无可考。”通过后来李白所作的诗歌《上李邕》可以推测,此次相见两人应该是所谈不多,彼此都无好感,随即不欢而散。

有学者认为李白与李邕相见当在李邕担任渝州刺史期间(718年~720年)。其时李白并未出蜀,只在匡山读书,从赵彝学习剑术,游学梓州,至开元二十年(724年)始出蜀,游峨眉,后买舟而下,初至渝州,彼时李邕已经在陈州任上。又有学者认为两人相见当在天宝五年(746年),于齐州历下亭与杜甫、高适同游,此说亦不可信。从李白诗中“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之语可知,李白此时已经四十五岁,不会再以“后生”自居。清人王琦也认为《上李邕》当为李白青年时期所作。此次相见,却是宾主尽欢而散,李白对李邕歌颂不已,并有诗颂之曰:“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极力赞扬李邕执政北海的德政教化之功。杜甫亦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二诗,高适作有《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郡太守》《同群公出猎海上》等诗,李邕亦留有《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诗。

综上所述,安琪、薛天纬所论李白与李邕于天宝十四年(726年)相见陈州,当属可信之论。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久美子所作《李白年谱》亦说“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笈久美子认为在开元十四年的冬天,二人在陈州相见,但从时间上推断,彼时李邕正在牢狱之中,已经不可能见到。二人相见的当在公元726年春夏之际,才符合常理。但笈久美子所言公元726年二人见于陈州的论断,与安琪、薛二人观点基本相同。

李邕离开陈州一百二十三年后的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陈州人为李邕修建庙宇,特请李邕撰文,慕容谿书丹,刊刻了《唐淮阳太守李公庙记》(已佚),以为纪念。



非遗文化

伴着春风舞动的红灯笼和欢快的鼓点,龙年春节如约而至,中国大地被装点得喜气洋洋。在这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刻,非遗文化的展示与传播成为全民闹新春活动中的一大亮点,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非遗的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不可触摸的文化表现形式,包括传统的民间艺术、手工艺技能、民俗节庆等。它们承载着人类智慧和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节期间,各种形式的非遗文化展示活动,不仅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

春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去年,春节更是被联合国定为联合国假日。寓意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已受到众多国家的欢迎和重视。

今年的龙年春节,无论是在城市的璀璨夜景中,还是在乡村的烟火气里,非遗文化的身影随处可见。舞龙、舞狮、剪纸、泥塑、皮影戏、传统戏曲、打铁花……这些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不仅让国内外民众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也让他们了解到非遗文化背后所蕴含的中国力量。

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保持文化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设立“文化遗产日”、编制非遗名录、开展非遗传承人培训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对于本土文化的自豪与自信。通过这些努力,非遗文化焕发新生,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也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非遗文化的普及与推广,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节日,目前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国鼓励和支持非遗文化走出国门,通过文化交流、国际展览等形式,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享受这场文化盛宴。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也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学习。

非遗文化的创新与融合展示了中国的创造力。在当代,非遗文化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许多非遗项目结合现代科技和时尚元素,推出了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的产品和表演,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喜爱。这种创新不仅使非遗文化更加生动活泼,也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和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

非遗文化的参与性与教育性反映了中国的社会责任感。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和文化机构举办了各种互动体验活动,让公众亲身参与到非遗文化的实践中去。无论是亲手制作一个窗花,还是尝试一段地方戏曲,人们在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传承。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传播方式,不仅提升了公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 and 兴趣,也培育了社会的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非遗文化闹新春的背后,是中国力量的多维度展现。从文化自信到文化包容,从创造力到社会责任感,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仅是对传统的保护,更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世界分享。在这欢乐祥和的节日里,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感受到了非遗文化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和力量。让我们携手共进,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续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闪耀更加绚丽的光芒。



舞龙表演。

梁照曾 摄